

区域价值链视角下的中东欧国家经济转型

——以波兰、匈牙利、捷克和斯洛伐克为分析对象

余南平 夏菁

内容提要:本文以区域价值链为视角,分析研究了中东欧波兰、匈牙利、捷克和斯洛伐克四国在全球与欧洲区域价值链中的位置与角色,包括其进出口产业结构和行业价值链特征。通过研究发现,以德国为核心的欧洲区域价值链构建是中东欧四国经济转型成功的必要前提,中东欧四国既有的产业配套基础、开放的市场与适度的劳动力技能,是其融入以德国为核心的区域价值链的充分条件,中东欧四国搭载与融入德国产业链推动了经济转型的成功。关于中东欧经济转型的研究成果显示,中东欧四国通过制造业产业融入全球和区域价值链所取得的成就,证明了实体经济与中高端制造作为国家经济“压舱石”的重要性,而如何迎接新技术革命的挑战,以研发和创新维护和提升自身在全球与区域价值链中的能力,成为中东欧四国继续转型与发展的新问题。

关键词:中东欧 经济转型 全球价值链 区域价值链

自2004年起,众多中东欧国家先后加入欧盟,在经历15年的转型与融入欧洲后,中东欧国家经济社会均有不同程度的发展。究竟应该如何评估中东欧国家的转型?其经济发展的载体和依托基础又是什么?本文试以区域价值链为研究工具,分析波兰、匈牙利、捷克和斯洛伐克四个最具有代表性的中东欧国家经济和产业链的结构变化,考察中东欧四国在欧盟区域价值链中的位置和角色及其产业与德国核心价值链之间的联系,以评估中东欧四国经济转型差异化的具体表现,并提出对区域价值链和经

济转型的若干思考。^①

一 国内外关于中东欧转型研究的综述

中东欧转型作为一个复杂和长时段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整体变革过程,一直得到学界来自各种视角的关注与研究。

在中东欧的政治转型研究方面,项佐涛认为,由于内外部因素不同,中东欧国家的政治发展呈现两种模式:一种是波兰等国平稳演进型,即政治发展相对平稳、民主制度较为巩固;另一种是除斯洛文尼亚外前南地区的冲突裂变型,政治发展受民族主义影响较大。中东欧国家政治转型的大方向是以多党竞争为主要内容的民主制度,但仍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②甘小明指出,中东欧国家的政党政治、民主化和人权保障三个政治问题在入盟前后的发展情况存在差异,中东欧国家政治转型在不同历史阶段呈现不同的发展趋势。入盟后中东欧国家迎来新的发展期,参与欧盟内部各项政治活动,加上其他成员国的影响和渗透,在民主政治、社会经济等方面有了更明确的目标。^③杨帅认为,中东欧国家近30年来积极实现政治上的转型,建立议会民主制、多党制,实施全方位外交等,但同时造成就业率下降、贫困人口增加等社会问题。^④此外,关于转型中的中东欧政党研究方面,徐刚认为,20世纪90年代新民粹主义政党出现在中东欧国家但未成为主流,在相继加入欧盟后,新民粹主义政党在许多国家先后上台执政,成为转型过程中的新力量。^⑤余南平等则从政党转型的角度认为,除少数比较稳定的波罗的海国家、波兰以外,中东欧政党结构仍处于未稳定阶段,尤其是政治和公共管理的边界不清带来的困惑,将长期影响中东欧国家的政治和政府能力。^⑥

在中东欧的经济转型方面,国内学者研究较少。孔田平认为,中东欧经济转型包

^① 经济转型是一个广泛被讨论的话题,在广义上通常指经济体制转型,而在狭义上也可以指经济增长方式、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转变。在广义讨论的语境下一般是指20世纪90年代全球开启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如1996年世界银行《从计划到市场发展报告》中指出,转型的长期目标是建立一种使得生活水平长期提高的繁荣的市场经济,既是社会转型,也是经济转型。而“经济转型”这一概念最早却是由前苏联政治家和经济学家布哈林在1920年《过渡时期经济学》中提出的,其研究商品经济向计划经济的过渡与转化。上述研究文献,参见世界银行编著:《1996年世界发展报告:从计划到市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年版;[苏]尼古拉·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 第一部分 转化过程的一般理论》,余大章、郑异凡译,三联出版社1981年版。而本文讨论的转型是以狭义上的经济转型为研究对象。

^② 项佐涛:《中东欧政治转型的类型、进程和特点》,载《国际政治研究》,2010年第4期,第31-41页。

^③ 甘小明:《中东欧国家入盟前后政治改革比较研究》,硕士论文,南昌大学,2014年。

^④ 杨帅:《中东欧国家政治转型研究》,硕士论文,山东师范大学,2016年。

^⑤ 徐刚:《中东欧社会转型中的新民粹主义探析》,载《欧洲研究》,2011年第3期,第52-69页。

^⑥ 余南平、周生升:《后金融危机时代中东欧欧盟国家的政党政治结构变迁》,载《俄罗斯研究》,2014年第1期,第43-73页。

括四个要素:稳定化、自由化、私有化和制度化。在经济增长、生活水平提高等取得一定成就后,当然也面临政府作用界定、加强法治、国有企业改造、金融改革深化以及社会层面改革等挑战。^① 余南平等认为,后金融危机时代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经济表现不同,在科研创新、教育发展等方面,中东欧国家面临共同挑战。^② 孙景宇等认为,中东欧转型国家经济增长的动力来自内需,经济增长模式出现问题的根源是政府决策失误,未来的经济增长模式的核心是实体经济,重新确立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位置,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抓住改革的机会促进经济发展在正确的轨道上前进。^③

不可否认,中东欧国家的社会转型是伴随着政治和经济转型进行的,孔寒冰指出,中东欧国家社会转型存在多样性和复杂性,且不可能消失,包括中东欧和东南欧的统一的大欧洲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景。徐坡岭等认为,政治民主化为经济转型开辟了空间,确定了转型的方向和范围,经济转型的发展反过来对政治转型做了合法性解释,并要求政治制度根据需求调整。中东欧转型的总体成果取决于政治民主化和经济市场化转型的相辅相成。^④ 孔寒冰认为,考虑到国家自然规模、经济水平、文化归属、与大国关系等众多不同,中东欧16国的主要特征是社会发展差异性大、相互关系复杂。^⑤ 何山华具体分析了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三国的语言权利和语言保护,认为虽然中东欧的语言权利在转型过程中得到持续改善,但未改变小语言衰落的趋势。^⑥

关于中东欧转型的综合分析研究,朱晓中指出,中东欧国家经历20世纪末转型危机、2004年加入欧盟后的危机以及2008年主权债务危机,出现了背离欧洲主流发展、民主化“回落”现象。由此可见,中东欧国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存在一些问题。^⑦ 孔寒冰认为,中东欧国家27年来在政治转型、经济转型和社会发展方面都有很大的时空差异,20世纪基本完成政治转型,但中东欧国家在经济转型和融入欧洲的进度明显不同。^⑧ 朱晓中还指出,中东欧模式属于独特的资本主义类型,发展和超越老成员国是转型的目标;大多数西方学者认为中东欧转型已经完成,但也有学者认为才刚刚开

① 孔田平:《中东欧经济转型的成就与挑战》,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2年第2期,第60-72页。

② 余南平、孔令兰萱:《后金融危机时代中东欧社会经济转型评估》,载《俄罗斯研究》,2013年第4期,第65-114页。

③ 孙景宇、叶潇予:《中东欧转型国家经济增长模式评析》,载《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第92-97页。

④ 徐坡岭、韩爽:《中东欧独联体政治经济转型20年:约束条件与转型政策、策略选择》,载《俄罗斯研究》,2011年第5期,第90-104页。

⑤ 孔寒冰:《起始、剥离与回归——中东欧国家20世纪的两度社会转型》,载《欧亚经济》,2019年第3期,第28-41页。

⑥ 何山华:《中东欧转型国家语言权利与小族语言保护研究》,博士论文,北京外国语大学,2015年。

⑦ 朱晓中:《中东欧国家转型过程中的三重危机》,载《俄罗斯学刊》,2015年第6期,第18-28页。

⑧ 孔寒冰:《27年,中东欧国家经历的不仅仅是社会转型》,载《世界知识》,2017年第3期,第45-47页。

始,其经济结构存在深层次缺陷。西方部分学者认为,波兰、匈牙利等国存在“民主倒退”,政治转型可能出现逆转。^① 项佐涛等肯定了中东欧社会转轨 30 年,在政治民主化、经济私有化和市场化、对外关系西方化上取得一定成绩,同时指出转型导致政治极化、经济独立性受损、疑欧主义与民粹主义兴起、各国发展存在显著差距等问题。政治民主化和经济转型的关联性不强,匈牙利、波兰、捷克近年来是民粹主义政党执政,但同时市场经济运行良好。中东欧内部也存在巨大差距,波兰、匈牙利、捷克和斯洛伐克的转轨绩效显然优于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原因是这些国家曾有过西方式政治实践,从社会主义时期就改革计划经济。^②

除了国内学者的研究外,国外学者对中东欧的转型也有较多关注。其中包括佩特拉科斯(George C. Petrakos)认为,中东欧国家市场化进程复杂、融入西欧经济后将影响中东欧区域一级的经济表现,中东欧国家在欧洲新空间秩序中的战略地位也将决定加入西欧一体化的步速和成功与否,并将对发展空间产生决定性影响。^③ 斯洛文尼亚学者特加(Žiga Turk)指出,中东欧国家自 1989 年以来经历了极权政治、计划经济、社会主义向民主体制、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的过渡。波兰、捷克和斯洛伐克正在完成这一进程,匈牙利和斯洛文尼亚由于选择了渐进主义的改革方式而步伐明显落后。^④ 捷克查理大学的吉鲁德克(Adéla Jiroudková)等提出,中东欧经济转型和加入欧盟是否成功,将影响到目前的发展和进一步融入欧盟的深度,而中东欧转型存在众多内外部因素的困扰,如政治文化和路径依赖、公民社会薄弱、欧盟一体化危机,包括俄罗斯的外部影响等。^⑤

上述研究从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综合宏观角度,对中东欧国家转型进行了不同历史阶段的研究和分析。但归纳起来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东欧国家转型不同于其他经济体的转型,正如徐刚所言,哥本哈根入盟协议对中东欧国家的政治和经济转轨具有巨大的约束力。它不仅规定了中东欧国家的转轨方向、目标和基本领域,也成为

① 朱晓中:《转型三问——写在中东欧转型 30 年之际》,载《当代世界》,2019 年第 4 期,第 24-28 页。

② 项佐涛、李家懿:《中东欧转轨三问——30 年历程的回顾与反思》,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9 年第 6 期,第 83-91 页。

③ George C. Petrakos, “The Regional Dimension of Transition in Central and East European Countries: An Assessment,” *Eastern European Economics*, Vol.34, No.5, 1996, pp.5-38.

④ Žiga Turk,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in Transition: An Unfinished Process?” *European View*, Vol.13, No.2, 2014, pp.199-208.

⑤ Adéla Jiroudková et al., “EU Accession, Transition and Further Integration for the Countries of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Economics & Sociology*, Vol.8, No.2, 2015, p.11.

中东欧国家改革的“挡箭牌”。^①因此,中东欧自身被定义过的广义“转型”标准基本是以欧盟的入盟标准为蓝本的,如法治、市场经济、政治民主的各种“对标”,而这个视角也是学界既有研究已经充分关注和讨论的。但如果我们抛开广义上的经济转型讨论与判定,将研究的视角下沉,从狭义的经济和产业结构视角出发,特别是在相对底层的区域价值链层面进行分析,又可以观察到中东欧国家是如何融入欧盟市场的,特别是其与德国产业链发生了哪些紧密的产业间联系。而且,这种产业链的内嵌式联系,又是如何构建中东欧国家与欧盟的内在有机联系,并推动中东欧国家自身经济转型的呢?诸如此类的问题,值得深入探讨。

二 区域价值链(RVC)研究的简述

区域价值链(RVC)并不是一种特殊的价值链形态,它是指价值链分工过程中,生产的价值创造环节主要以区域而非全球形态而出现。正如瑞士日内瓦高级国际关系及发展学院教授理查德·鲍德温等人所说:“价值链全球化在某种程度上是误读,价值链全球化特征并不明显,更多是呈现区域化特征,并且以美国、德国、日本和中国四个核心国家为主,周边其他国家主动嵌入这四大‘核心’所在的价值链,从而形成北美、欧洲和亚洲区域价值链,但各个区域价值链并不是孤立的,而是通过国际贸易和跨国公司形成彼此间联系的。”^②关于区域价值链的相关研究,不仅国内外相关文献涉及相当有限,且研究视角多是在全球价值链框架下分析某一地区的某一行业,或是简单等同于区域贸易。国外学者贝克尔(Koen De Backer)等人研究指出,贸易政策和全球价值链的参与存在明显的区域层面关系,区域内的贸易机制如自贸区 and 关税同盟等都和区域价值链形成的强度相关,且扩大了区域间原产地规则的规模,更有助于建立区域价值链。^③克里希南(Aarti Krishnan)通过对非洲肯尼亚园艺的价值链案例研究,确定了两种区域价值链与全球价值链之间相互作用的类型,即自然型的区域价值链和构建型的区域价值链,并建议必须在全球价值链背景下考虑区域价值链自身的建设与拓

^① 陆南泉主编:《曲折的历程 中东欧卷》,东方出版社2015年版,第148-149页。有关哥本哈根入盟协议,参见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Presidency Conclusions: Copenhagen European Council,” 1993, 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ueDocs/cms_Data/docs/pressData/en/ec/72921.pdf, 2020年1月15日访问。

^② 鲍德温等人的相关研究文献,参见 <https://www.nber.org/papers/w18083.pdf>; <https://www.nber.org/papers/w18957.pdf>, 2020年1月15日访问。

^③ Koen De Backer et al., “Analyzing Global and Regional Value Chains,”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Vol.153, No. 5, 2018, pp.3-10.

展。^① 苏德(Gabriele Suder)等运用投入产出技术量化分析,从区域价值链角度分析了1990-2005年长时段的亚洲东亚生产网络的演变,从中发现东亚地区经济体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反映了充满活力的东亚地区价值链的结构模式。^② 福德(Niels Fold)对全球价值链进行了区域研究,并将特定的行业价值链研究引入区域分析,他们通过对区域经济活动如何创造、增强、获取和分配价值进行了系统性的检验,并认为区域经济活动直接与全球价值链相关联,而区域自身需求中也会衍生消费品和资本积累。^③ 相较于国外学者,国内学者更关注的是“一带一路”建设视角下区域价值链构建问题。魏龙等基于WIOD数据和KPWW方法,运用RCA指数、价值链位置指数等探讨中国从嵌入欧美日主导的全球价值链转化为自我主导的区域价值链的可行性。他们认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产业间、产业内的互补性高于竞争性,中国占据价值链的高附加值环节,具有主导区域价值链的基础。^④ 钱书法等基于比较优势理论,主张本土产业可通过融入全球价值链或构建国家价值链提升竞争力。中国应超越比较优势思路,主动引领“一带一路”区域价值链的构建,并列举出中国与沿线11国可行的产业组合,以实施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⑤ 孙铭壕等基于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和UNCTAD-Eora数据库分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1990-2017年贸易增加值,认为新兴工业化国家出口增加值增长最快,带路沿线最不发达国家并未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生产体系,许多发展中国家出现“环节锁定”弊端,中国可与带路沿线国家构建新的“雁阵模式”。^⑥ 陈健等则提出了中国主导“一带一路”区域价值链的路径,认为应该促进中国企业差异化发展,提高沿线投资水平,健全中国产业体系,完善沿线产业分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夯实经贸合作基础,扩宽市场空间,构建以中国为枢纽的“一带一路”沿线双向环流价值链,实现中国从外围到核心的转变。^⑦ 此外,还有更细化的行业性

① Aarti Krishnan, "The Origin and Expansion of Regional Value Chains: The Case of Kenyan Horticulture," *Global Networks*, Vol.18, No.2, 2018, pp.238-263.

② Gabriele Suder et al., "The Evolving Geography of Production Hubs and Regional Value Chains Across East Asia: Trade in Value-Added,"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Vol.50, No.3, 2015, pp.404-416.

③ Niels Fold, "Value Chain Dynamics, Settlement Trajectories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Regional Studies*, Vol.48, No.5, 2014, pp.778-790.

④ 魏龙、王磊:《从嵌入全球价值链到主导区域价值链——“一带一路”战略的经济可行性分析》,载《国际贸易问题》,2016年第5期,第104-115页。

⑤ 钱书法、郜俊杰、周绍东:《从比较优势到引领能力:“一带一路”区域价值链的构建》,载《改革与战略》,2017年第9期,第53-58页。

⑥ 孙铭壕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参与全球价值链位势分析——基于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和增加值核算法》,载《湖北社会科学》,2019年第2期,第94-101页。

⑦ 陈健、龚晓莺:《中国产业主导的“一带一路”区域价值链构建研究》,载《财经问题研究》,2018年第1期,第43-49页。

研究,如李晨等关注了区域价值链中的水产品出口贸易,^①刘永泉探究了木制林产品的区域价值链等。^② 这些成果显然为“一带一路”高水平建设推进奠定了务实化研究的基础。

在中东欧国家(CEECs)参与区域价值链方面,国内尚无相关的直接研究。但早在2010年,英国《金融时报》就敏锐地注意到德国经济在欧债危机中特立独行的增长表现,并发现了德国与中东欧邻国同步繁荣的现象,还将其原因解释为德国与中东欧国家之间的供应链紧密整合。^③ 马丁内斯(Inmaculada Martínez-Zarzoso)等指出,中东欧国家加入欧盟对中间商品和最终商品的贸易产生了积极显著的影响。更深层次的一体化和贸易壁垒的消除增加了贸易体量,丰富了贸易品种。贸易成本下降有利于生产过程的细化分解,以及更好地利用区域经济比较优势和区位优势。^④ 格雷戈里(Tullio Gregori)比较了保加利亚、捷克、匈牙利、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五国的竞争力,得出这五个中东欧国家差异度较小,而产业价值链存在巨大的整合空间的结论。^⑤ 肯特大学的范(Olmo Van Assche)等探究了中东欧10国(CEEC-10)通过拆分价值链进行的生产共享,并认为这些国家确实可以被视作欧盟15国(EU-15)的深加工区域,中东欧10国出口的70%和进口的60%总量均来自欧盟15国,区域生产共享对贸易总量增加有影响,但不会带来国际贸易方面的结构性变化。^⑥ 哥廷根大学卡普兰(Lennart Kaplan)等研究中东欧10国加入欧盟后如何影响欧洲供应链和贸易的问题,认为CEEC国家向欧盟的低技能附加值出口出现了超比例的增长,这有利于新成员国和其他东欧国家(非欧盟成员国)更加深入地融入区域价值链。^⑦ 克尔桑(Ines Kersan-Škabić)研究了欧盟成员国的全球价值链(GVC)参与指数,得出卢森堡、斯洛伐克和匈牙利是全球价值链中整合度最高的国家,而克罗地亚则是整合度最低的国家。他的研

① 李晨、王丽媛:《中国主导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区域价值链构建研究——以水产品出口贸易为例》,载《宏观经济研究》,2018年第9期,第72-84页。

② 刘永泉:《“一带一路”区域价值链的基本条件——基于中国木质林产品的分析》,载《林业经济》,2019年第2期,第55-61页。

③ Ralph Atkins and Jan Cienski, “Germany Spreads Benefits of Revival to Neighbours in East,” *Financial Times*, November 12, 2010, p.6.

④ Inmaculada Martínez-Zarzoso et al., “CEECs Integration into Regional Production Networks. Trade Effects of EU-Accession,” Paper Presented to the Conference on “Proceedings of the German Development Economics Conference”, Berlin, 2011.

⑤ Tullio Gregori, “Comparative Advantages in CEEC-5,” in Suzana Laporšek and Doris Gomezelj Omerzel, eds., *Managing Global Changes*, University of Primorska Press, 2016, pp.441-451.

⑥ Olmo Van Assche et al., “The Weight of Regional Production Sharing Networks in the CEEC-10,” Master Thesis, University Gent, 2011-2012.

⑦ Lennart C. Kaplan et al., “Supply-chain Trade and Labor Market Outcomes: The Case of the 2004 European Union Enlargement,”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Vol.26, No.2, 2018, pp.481-506.

究显示人均 GDP、工资、FDI 流入、研发支出等都对全球价值链(GVC)参与度有不同的影响。^①

这些既有的区域价值链视角的研究,无疑对于以产业和贸易角度深入研究中东欧国家的产业格局、技术来源、市场空间给予了很好的启示。而中东欧国家在经历政治、经济转型 15 年后,其在欧盟内部市场中究竟处于什么样的角色,这对于贸易总量近 70%来自内部贸易的欧盟的供应链完善不仅十分重要,同样,对中东欧国家自身经济转型,包括中东欧国家在欧盟中的地位也非常重要。

三 中东欧四国在全球与欧洲区域价值链的位置和角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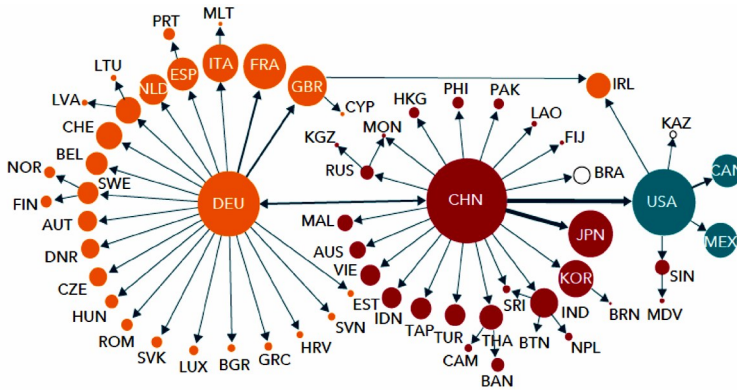
诚如在许多既有研究中已经分析和指出的那样,区域价值链并不是一种独立的自我循环价值链,它首先是作为全球价值链的组成而存在的。^②过去 30 年来,在经历了冷战结束后全球投资、贸易自由化与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区域一体化的高速发展后,全球目前形成了欧洲德国、亚洲中国、美洲美国的全球三大价值链中心,而价值链的中心国,也可以被认为是价值链“轴心”,不仅在全球价值链中拥有足够的规模体量,而且更重要的是,价值链的中心国既是区域的经济增长驱动力,同时其还以技术、资本、生产网络配套作为枢纽和支点,链接和整合所在区域的其他国家的边缘生产能力,进而辐射和覆盖区域与全球的生产与消费。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WTO)新发布的《2019 年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显示,在整个欧洲,德国已经无可撼动地成为欧洲区域价值链的中心和枢纽。欧洲的区域价值链以德国为中心进行整合,而中东欧的捷克、匈牙利、斯洛伐克均在以德国为核心的区域价值链有所体现。波兰在 2000 年榜上有名,2017 年已经逐渐落后。虽然在过去 15 年间,中东欧国家通过融入欧盟,其经济规模有了持续的增长,但与英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和荷兰等传统工业化国家相比,中东欧国家在欧洲区域价值链上的体量目前还比较小(见图 1)。

^① Ines Kersan-Škabić, “The Drivers of Global Value Chain (GVC) Participation in EU Member States,” *Economic research-Ekonomska istraživanja*, Vol.32, No.1, 2019, pp.1204-1218.

^② 历史上出现过极端区域价值链的特征,如冷战期间苏联以“经互会”形式和苏制标准组织和架构苏东地区的区域生产体系,并形成了与世界几乎割裂的区域性价值链。

图 1 2017 年传统贸易网络(所有商品和服务)



资料来源:《2019 年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第 27 页, https://www.wto.org/english/res_e/booksp_e/gvc_dev_report_2019_e.pdf,2020 年 1 月 10 日访问。图中“CHN”代表“中国”,“USA”代表“美国”,“DEU”代表“德国”。

全球价值链(GVC)的总参与度,包括前向与后向参与度是反映一个国家参与全球价值链,并在其中依据产业能力参与全球和区域分工的数据量化指标。我们采用世界贸易组织(WTO)增值数据,计算中东欧波兰、匈牙利、捷克和斯洛伐克四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指数后发现(见表 1),中东欧四国均高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这表明转型后的中东欧四国已经非常充分地融入了全球价值链。而这四国的总参与度由高到低排列,分别为斯洛伐克、匈牙利、捷克和波兰。前三者的后向参与度远高于前向参与度,表明斯洛伐克、匈牙利、捷克三国是以加工贸易作为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主要途径,其特点是进口中间品后经过加工装配工序再出口,这对分析中东欧四国在区域价值链中的参与度和角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表 1 中东欧四国 2015 年 GVC 参与度指数(占总出口额的百分比)

	GVC 总参与度	前向参与度	后向参与度
波兰	48.1	21.5	26.6
匈牙利	59.2	16.2	43.1
捷克	58.6	19.4	39.3
斯洛伐克	63.6	18.8	44.8
发达国家	41.4	20.0	21.4
发展中国家	41.4	20.8	20.6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 WTO 增值和全球价值链中的贸易统计资料计算得出, https://www.wto.org/english/res_e/statis_e/miwi_e/countryprofiles_e.htm,2020 年 1 月 10 日访问。

除了采用全球价值链参与指数的方法来观察中东欧国家对于全球与区域经济的融入外,我们还可以使用中东欧国家出口目的地和国内外增加值的方法,来观察中东欧国家与主要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紧密度,并在其中发现其国家贸易顺差来源和相对应的产业特点(见表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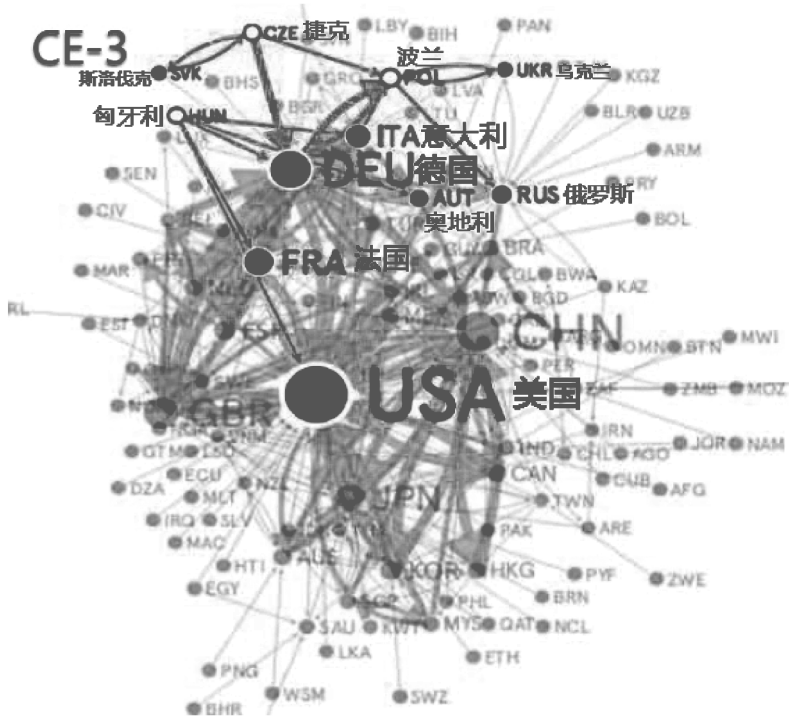
表2 2015年中东欧四国主要出口目的地国的内外增值出口含量

国家	出口目的地	占合作伙伴出口总额的百分比			占经济体出口总额的百分比	
		国内增值	国外增值	总计	国内增值	国外增值
波兰	1.德国	73.2	26.8	100.0	16.3	6.0
	2.英国	72.4	27.6	100.0	4.7	1.8
	3.法国	73.8	26.2	100.0	4.5	1.6
匈牙利	1.德国	54.4	45.6	100.0	11.0	9.2
	2.美国	55.6	44.4	100.0	4.1	3.3
	3.奥地利	63.5	36.5	100.0	3.2	1.8
捷克	1.德国	59.5	40.5	100.0	14.8	10.1
	2.斯洛伐克	62.3	37.7	100.0	4.3	2.6
	3.波兰	64.5	35.5	100.0	3.8	2.1
斯洛伐克	1.德国	53.7	46.3	100.0	9.6	8.3
	2.捷克	58.4	41.6	100.0	6.0	4.3
	3.匈牙利	57.2	42.8	100.0	3.7	2.8

资料来源:根据WTO增值和全球价值链中的贸易统计资料计算得出, https://www.wto.org/english/res_e/statis_e/miwi_e/countryprofiles_e.htm,2020年1月10日访问。

数据分析结果显示,毫无疑问,波兰、匈牙利、捷克和斯洛伐克的第一大出口目的地都是德国。除了匈牙利以外,中东欧四国的出口目的地主要集中在欧洲内部。捷克、斯洛伐克之间由于天然的历史渊源,彼此互为重要的贸易伙伴。波兰的贸易仍主要依靠西欧发达国家,但由于产业结构问题,其出口增值能力显然低于匈牙利、捷克和斯洛伐克三国。需要指出的是,匈牙利的第二大出口国为美国,并同时与法国、意大利、奥地利有规模不小的贸易往来(见图2)。这表明,近年来匈牙利致力于开放的投资政策,吸收各类国际资本,促进国际贸易的多样化并取得一定效果,也在一定程度上反衬匈牙利相比于其他中东欧国家政治表现的“另类”。

图2 中东欧关键贸易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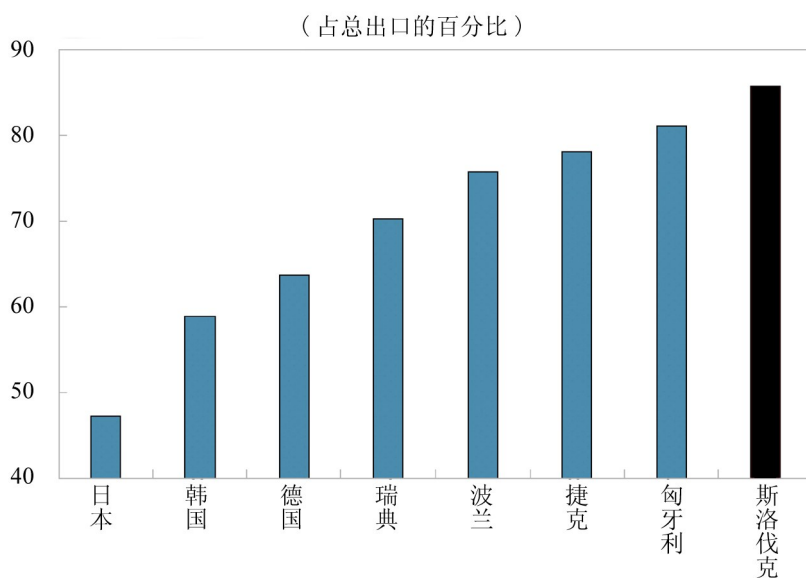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斯洛伐克:2019年第四条磋商》报告,第44页,<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CR/Issues/2019/07/11/Slovak-Republic-2019-Article-IV-Consultation-Press-Release-Staff-Report-47103>,2020年1月10日访问。

从贸易的指向性与价值链的形成角度看,斯洛伐克的关键贸易联系仅限于德国和捷克,捷克限于德国、波兰和斯洛伐克,而波兰由于有较大的地域活动空间和产业互补性特色,其对外贸易联系更加多元化。它不仅与德国、英国形成双回路贸易关系,同时还与俄罗斯发生部分贸易联系。因此,从区域价值链构造上来看,在中东欧四国中,斯洛伐克和捷克是更多地围绕以德国为核心的区域价值链,波兰较为离散,而匈牙利则以全球价值链为参与对象,不局限于欧洲市场的贸易联系,充分利用全球资源也是其近年来经济增速较快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宏观比较层面进一步观察中东欧四国自转型以来对于全球价值链的参与,我们可以发现就平均水平而言,斯洛伐克、匈牙利、捷克和波兰相较于发达的德国、瑞典、韩

国和日本的出口行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参与程度更高(见图3)。这表明,经济转型过程中,这些国家计划经济时代的产业基础已经在解构中再次完成了体系性的整合,中东欧四国凭借地理区位优势 and 低成本的熟练劳动力,在转型中充分融入以德国为核心和产业引领的区域价值链体系,匈牙利和波兰则分别通过多元化途径部分融入全球价值链体系,同时其在区域价值链中是以进口中间品再加工出口的角色出现,体现了产业结构对于区域价值链的依赖性和被动性。

图3 全球价值链(GVC)参与度国家间比较



资料来源:《斯洛伐克:2019年第四条磋商》报告,第17页。

四 中东欧四国进出口的产业结构特点

分析一个国家的出口行业增加值,不仅可以观察一个国家的产业竞争力,同时还可以对一个国家进行以产业链和价值链为观察视角的结构性链接分析。从数据分析的结果来看,中东欧波兰、匈牙利、捷克和斯洛伐克四国的出口主要集中在批发和零售贸易、运输和仓储、机动车、计算机和电子产品这些典型的行业。从四国的数据分析比较来看,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的机动车、计算机和电子产品国外增值部分较大,均在50%以上。这是与三国积极参与和融入德国为核心的区域价值链有直接的关联(见表

3)。而波兰出口行业前两位是传统的批发和零售贸易、运输和仓储,且波兰出口结构中绝大多数是国内增值部分,国外增值部分较少。这显示波兰和其他三国出口相比,其产业复杂度低并较少地参与欧洲以德国为核心的区域价值链。值得注意的是,机动车行业国外增加值较高是波兰、匈牙利、捷克和斯洛伐克共同的特征。虽然波兰的机动车出口国外增值不如其他三国,但却是三大主要出口行业中增值最高的行业。这个特征说明,德国领先全球的机动车制造价值链,不仅已通过产业整合嵌入中东欧地区,同时也是中东欧国家参与欧洲区域价值链并获得可观收益的主要行业渠道。从这个角度而言,德国保持和维护其机动车在全球价值链中的领先地位,不仅对德国经济至关重要,同时对中东欧地区的经济稳定增长也更有直接关联性。

表3 中东欧四国出口行业 2015 年国内外增值出口含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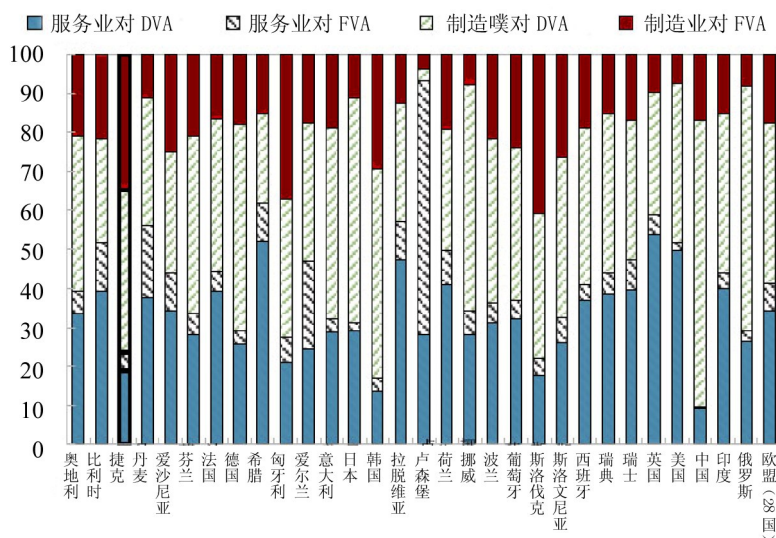
国家	行业	占行业总出口的百分比			占经济体总出口的百分比	
		国内增值	国外增值	总计	国内增值	国外增值
波兰	1.批发和零售贸易	88.5	11.5	100.0	11.9	1.6
	2.运输和仓储	81.6	18.4	100.0	7.5	1.7
	3.机动车	60.7	39.3	100.0	5.3	3.5
匈牙利	1.机动车	45.6	54.4	100.0	11.0	13.1
	2.计算机和电子产品	35.8	64.2	100.0	3.4	6.1
	3.运输和仓储	73.3	26.7	100.0	5.5	2.0
捷克	1.机动车	45.7	54.3	100.0	11.1	13.2
	2.计算机和电子产品	44.8	55.2	100.0	3.1	3.8
	3.运输和仓储	78.9	21.1	100.0	5.3	1.4
斯洛伐克	1.机动车	40.4	59.6	100.0	11.3	16.6
	2.批发和零售贸易	81.2	18.8	100.0	6.4	1.5
	3.计算机和电子产品	34.2	65.8	100.0	2.6	5.1

注:表由作者根据 WTO“增值和全球价值链中的贸易:统计资料”自制, https://www.wto.org/english/res_e/statis_e/miwi_e/countryprofiles_e.htm, 2020年1月12日访问。

除了对于以行业为观察视角的产业链和价值链结构剖析外,通过对出口总值的细化分解,更能解释一个国家当下的产业结构性特征。从数据分析的结果来看,目前中东欧国家中捷克、匈牙利、波兰和斯洛伐克的服务对总出口增加值的贡献相对较低,远

远不如制造业提供更多的增加值。传统上,根据 20 世纪 90 年代流行的“微笑曲线”原理,在全球分工的生产过程中,与生产、加工、包装、运输等环节相比,服务业比制造业活动产生的收益更高。但近些年以来,由于专业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特别是初级制造产业全球转移的停滞,高水平专业化制造所体现的增加值正在显著的提升,使得“微笑曲线”开始出现明显的修正而向“武藏曲线”转化。^①虽然波兰、匈牙利、捷克和斯洛伐克的服务业在总出口和出口国内增加值的份额表现上,相比欧洲其他国家处于最低水平,看似产业结构“老化”与产业“固化”(见图 4)。但正是由于中东欧四国,特别是匈牙利、捷克和斯洛伐克相对高水平的专业化制造存在,其在德国为核心的区域价值链中占据不可或缺的位置。因此,无论是欧债危机,还是危机后全欧洲的缓慢复苏中,中东欧四国的经济发展均领先欧盟平均增长水平。其内在原因就是中东欧四国

图 4 全球部分国家出口总值的分解(百分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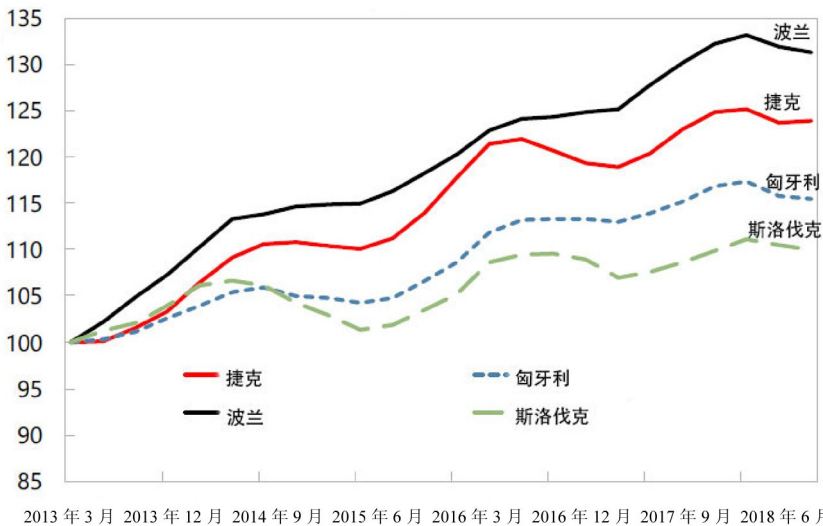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捷克:部分问题报告》,第 5 页,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CR/Issues/2019/06/12/Czech-Republic-Selected-Issues-46990>, 2020 年 1 月 12 日访问。

^① “武藏曲线”由日本索尼中村研究所的中村末广在 2004 年所创,其对日本企业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专业化的组装、制造具有较高的利润,而零件、销售、服务端反而利润低。“武藏曲线”的出现是对高端专业化制造“正名”的开始。近些年全球高端专业化制造越来越体现“武藏曲线”所描述的产业特征,如半导体光刻机的设备生产极为典型,全球唯一的生产公司荷兰 ASML 的年均 20 亿欧元的独家市场无人可以替代,且作为设备供应商,公司还有挑选客户的权力,而这在全球价值链专业细化之前是绝少发生的。

搭载的是德国价值链,而不是“欧洲价值链”,其可以透过德国全球价值链的扩张能力而免受欧洲内部经济下滑的影响。因此,中东欧四国,特别是捷克的低失业率的持续,正是中高端制造的相对高收入稳定,持续拉动了社会服务需求增长的直接体现。而这个通过数据验证获得的结论,在某种程度上推翻了“经济增长”路径发展逻辑假设,即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检验指标是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变化,即从制造业持续向服务业比例提升的转化。中东欧国家搭载德国价值链的相对专业化制造能力,其实已经成为中东欧国家的经济“稳定器”,并进一步提升了中东欧国家在欧盟内部的其他“议价能力”。

除了出口总值的分解可以观察一个国家在区域和全球价值链中的角色外,进口本身也是一个可以分析的视角。从历史数据观察来看,自2013年起,产业转型中的波兰、匈牙利、捷克和斯洛伐克开始持续扩大其在全球市场的进口比例。其中波兰增长最快,进口指数增长了35%(见图5)。考虑到波兰的经济和产业结构特点,可以认为

图5 中东欧四国占世界进口份额(百分比,指数:2000年第四季度=100)



资料来源:《捷克:2019年第四条磋商》报告,第14页,<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CR/Issues/2019/06/12/Czech-Republic-2019-Article-IV-Consultation-Press-Release-and-Staff-Report-46989>,2020年1月12日访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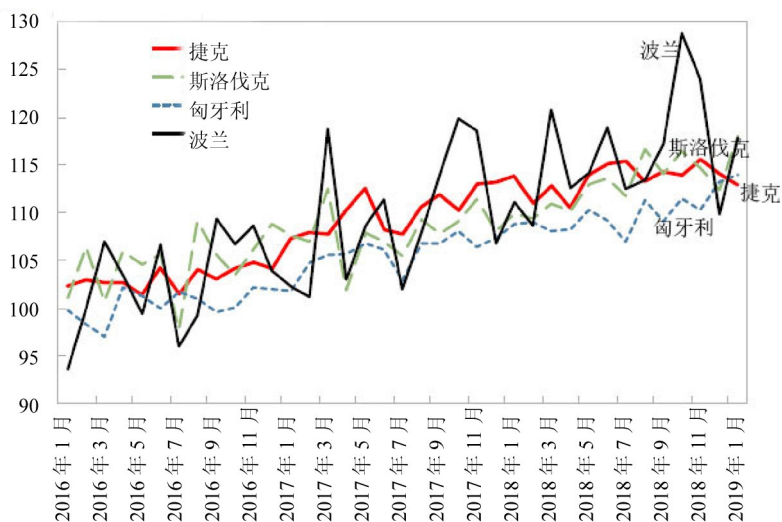
这种增长是基于波兰国内购买力增加后,对于高档最终制成品的需要增加,是经济水

平提升的表现。而捷克、匈牙利和斯洛伐克则不同,除了典型意义的国内消费需求增长外,其进口更多的是中间品,加工后再出口。因此,从进口增长需求不同的角度,也可以看到三国融入德国主导区域价值链的产业切入深度的不同。

五 中东欧四国的工业制造与行业价值链特点

从出口总值的分解中,我们已经看到工业制造对于中东欧的波兰、匈牙利、捷克和斯洛伐克四国是相当重要的。其不仅是国家外汇收入的主要来源,同时也是吸收就业、扩大消费与服务需求的基础。以波兰、匈牙利、捷克和斯洛伐克四国比较来看,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的工业制成品产自 2016 年以来至 2019 年基本保持持续增长,虽然中间有所波动,但相较于波兰的锯齿形大幅变化显得较为稳定(见图 6)。值得注意的是,一直稳定增长的捷克工业制造指数,在 2018 年年底达到顶点后,从 2019 年开始出现微幅回落。这种现象的出现是与德国出口回落同步的,而这种“拟合”的正相关性出现,可以进一步解释和说明,捷克作为德国在中东欧最大的“离岸工厂”,其产业链已经完全嵌入于德国价值链,德国经济的波动将影响捷克等中东欧国家的经济产出和价值链扩张。

图 6 中东欧四国工业生产(指数:2010年=100)



资料来源:《捷克:2019年第四条磋商》报告,第16页。

汽车行业,不仅对德国,同时对中东欧四国来说,都是绝对重要的产业。虽然在总量上,四国的汽车产量占全球总量不足1%,但汽车行业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较高,其中捷克占4.9%,匈牙利占7%。捷克目前是全球最开放的经济体,出口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80%,其中三分之二为国内增加值。它紧密地融入区域供应链,并高度集中在汽车行业。而汽车整车则是匈牙利的最大出口产品,其次是汽车零部件和火花点火发动机,占全部出口的16%。^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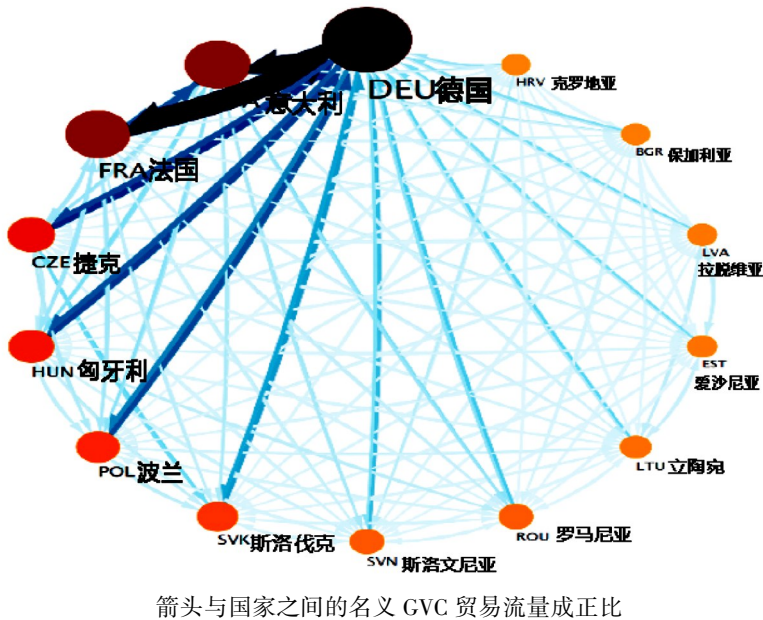
解析德国汽车行业的供应链(见图7),可以清楚地看到,在欧洲,除了意大利和法国以外,波兰、匈牙利、捷克和斯洛伐克是德国最大的贸易关系伙伴。其中,波兰几乎98%的汽车生产用于对外出口,其中最大市场是德国。波兰是德国大众汽车的东欧重要基地,拥有德国大众在欧洲最重要的两个发动机厂。此外,波兰制造的汽车配件如轮胎、汽车电子产品、座椅等广泛用于奔驰、大众等德国车企,以及法国、意大利等汽车企业。德国博世公司在匈牙利设立的公司是全球最大的汽车电子部件生产中心,匈牙利奥迪公司是匈牙利最大的出口企业。而捷克的汽车出口和国内销量最高的原因是因为拥有斯柯达百年品牌,且其母公司已经为德国大众收购。斯洛伐克是大众集团的高档车制造基地,旗下途锐、奥迪Q7、保时捷卡宴的车身均在斯洛伐克生产。^②德国汽车工业的区域化生产表明,德国的汽车工业经历了行业竞争的充分整合后,其区域一体化和区域价值链的特征已经完全显现。单就汽车行业本身而言,德国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全产业链”国家。

深度融入以德国为首的区域价值链中,并且以汽车为代表的工业制成品作为主要出口商品,使得波兰、匈牙利、捷克和斯洛伐克的经济易受外部需求下降的冲击。而从汽车行业价值链的特点来看,其投入资金量大、技术复杂程度高且需要较长和持续的产品研发周期。因此,波兰、匈牙利、捷克和斯洛伐克这些相对较小规模的开放经济体,只能作为增值较低的装配中心而存在。如果中东欧国家要提升其在区域价值链中的位置,就必须改变依赖外部因素的装配中心的角色,并提升其在区域和全球价值链中的能力。而这除了政府的政策支持外,高素质的劳动力和劳动力市场基础、强大的研发和创新能力提升将显得无比重要。

^①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捷克2019年第四条磋商报告》,第17-18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匈牙利2019年第四条磋商报告》,第30页,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CR/Issues/2019/12/04/Hungary-2019-Article-IV-Consultation-Press-Release-Staff-Report-and-Statement-by-the-48848>, 2020年1月15日访问。

^② 《中东欧国家汽车产业国别研究》, 搜狐网, https://www.sohu.com/a/287779615_120058056, 2020年1月12日访问;《东欧汽车产业的全球化解读》, 中国财经网, <http://finance.china.com.cn/roll/20150821/3303621.shtml>, 2020年1月12日访问。

图7 德国汽车工业行业供应链解构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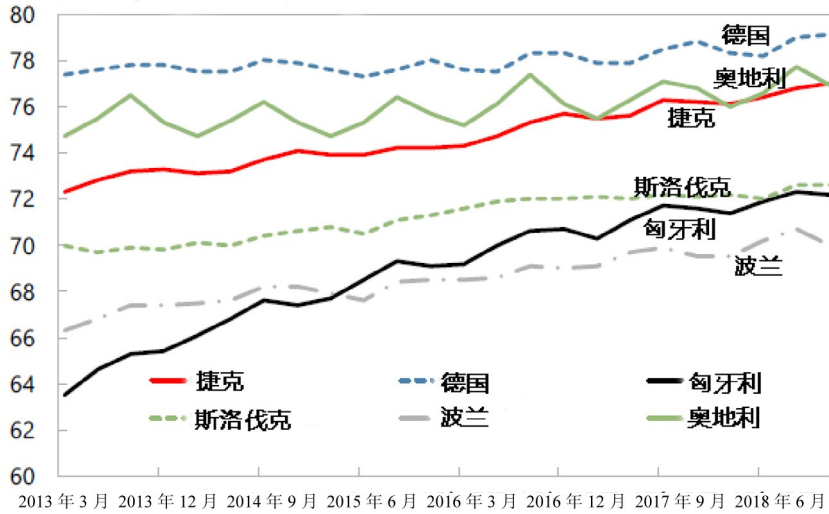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匈牙利:2019年第四条磋商》报告,第31页。

六 中东欧四国劳动力市场与研发创新潜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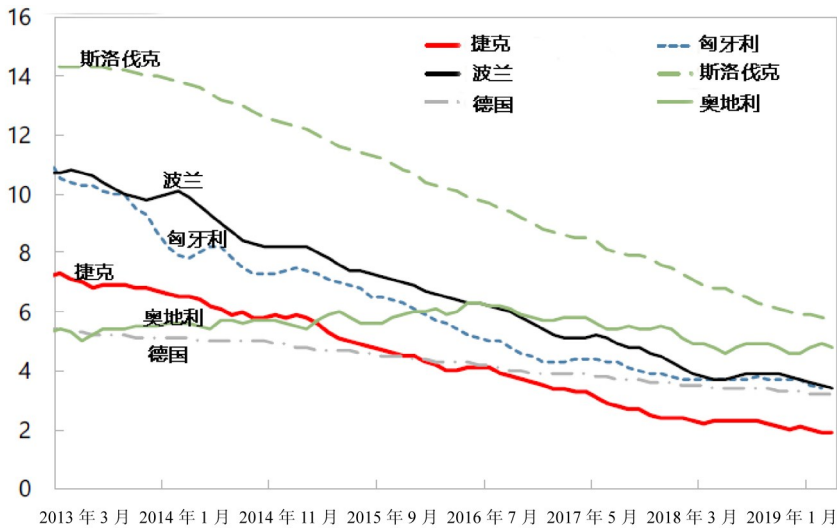
分析比较波兰、匈牙利、捷克和斯洛伐克的劳动力参与率可以发现,中东欧四国的劳动力参与率自2013年起稳步上升,由高到低为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波兰。虽然目前四国平均水平依然低于欧洲表现最好的国家德国,但其中表现最佳的捷克已经接近奥地利并向德国靠拢(见图8)。同时,从困扰全欧洲的失业角度看,中东欧四国的失业率自2013年以来也逐年下降,除斯洛伐克外,捷克、匈牙利和波兰的失业率均位于欧盟最低水平,三国平均水平低于4%,而捷克的失业率甚至达到了令人惊奇的2%左右(见图9和图10)。中东欧四国集体出现的劳动参与率提升与低失业率,不仅在经济表现上为传统发达的西欧国家做出劳动力市场“另类样板”的表率;在政治上,也必然会提升中东欧国家来自“政治正确”的“底气”,而不用担心国内民众支持率的下降。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目前维谢格拉德集团国家因为各自不同的诉求,经常在欧盟各种议题上发出自己独立的“声音”,以显示自身的强大存在。

图8 劳动力参与率(人口百分比,16-64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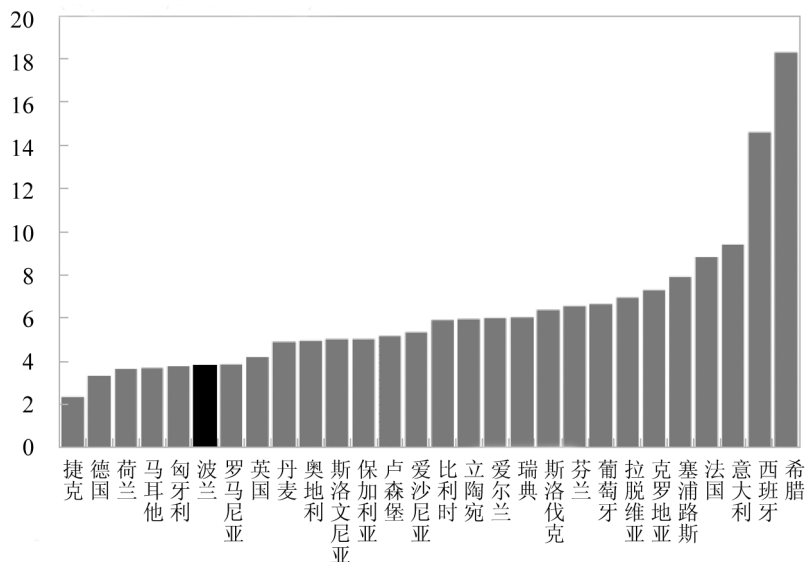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捷克:2019年第四条磋商》报告,第10页。

图9 德国、奥地利与中东欧国家失业率(百分比)



资料来源:《捷克:2019年第四条磋商》报告,第10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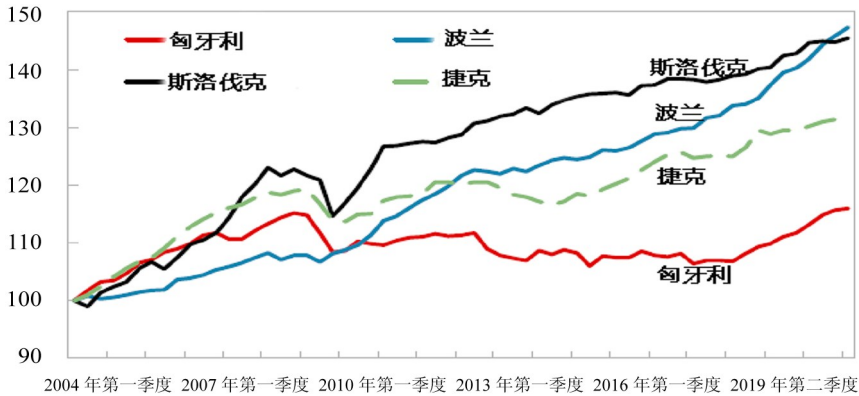
图 10 欧盟的失业率(百分比,2018 年第三季度)



资料来源:《波兰:2018 年第四条磋商》报告,第 11 页,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CR/Issues/2019/02/05/Republic-of-Poland-2018-Article-IV-Consultation-Press-Release-Staff-Report-and-Statement-by-46576>, 2020 年 1 月 15 日访问。

经济学已经反复提示和证明,检验一个国家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增长,或者说“经济转型”是否成功的最重要指标是社会劳动生产率。根据这项关键指标检测,自 2004 年四国加入欧盟以来,其总体劳动生产率是持续提高的。虽然受 2008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中东欧四国劳动生产率出现了“拐点性”回落。其中波兰因为内向型经济受到影响较小。但令人奇怪的是,自 2010 年以来,在欧洲国家全面受到欧债危机冲击、经济出现下滑以及劳动生产率下降的大背景下,中东欧四国的劳动生产率却逆势而上,完全没有受到影响(见图 11)。其中重要的原因,如同以上解释,是由于在经济转型过程中,中东欧四国不断通过德国融入区域价值链,同时注重产业链的配套,稳定制造业实体经济发展,公共债务控制良好。除了匈牙利由于阶段性的金融、地产泡沫影响而出现劳动生产率滞后外,其余三国均沿着实体经济优先发展的路径进行经济转型,而该经验对于后发经济转型国家而言具有极大的借鉴价值。

图 11 中东欧四国劳动生产率(2004年第一季度=1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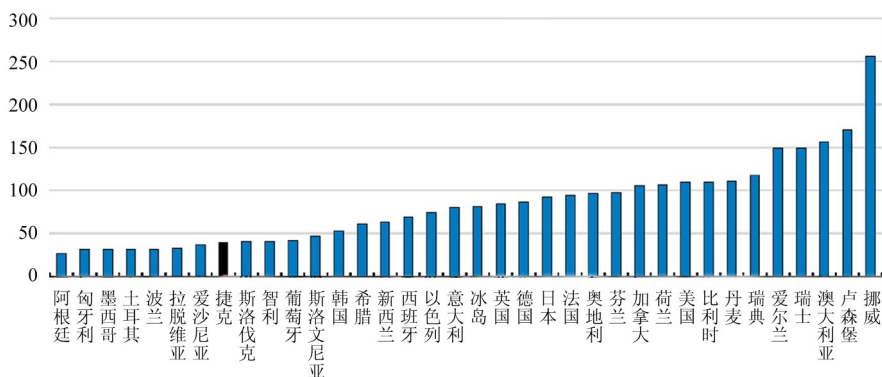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匈牙利:2019年第四条磋商》报告,第10页。

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原因非常复杂,或是来自技术创新进步的驱动,或是来自管理水平提升和产业流程的优化。而从全球比较范围而言,虽然波兰、匈牙利、捷克和斯洛伐克四国在区域价值链中参与度很高,但这种参与目前带来的增加值仍然较低。四国在价值链中所从事的工作多为知识密集程度较低、所需技能中等的行业(如汽车行业的大规模装配)。因此在通过参与区域和全球价值链、体现国外最终需求而维持大量工作岗位的行业中,中东欧四国每位工人所创造的增加值,目前还是低于欧洲发达国家的水平(见图12)。从这个角度看,中东欧四国目前转型阶段的劳动生产率提升贡献,更多是来自管理与产业流程的优化,其技术进步创新的影响因素还相对有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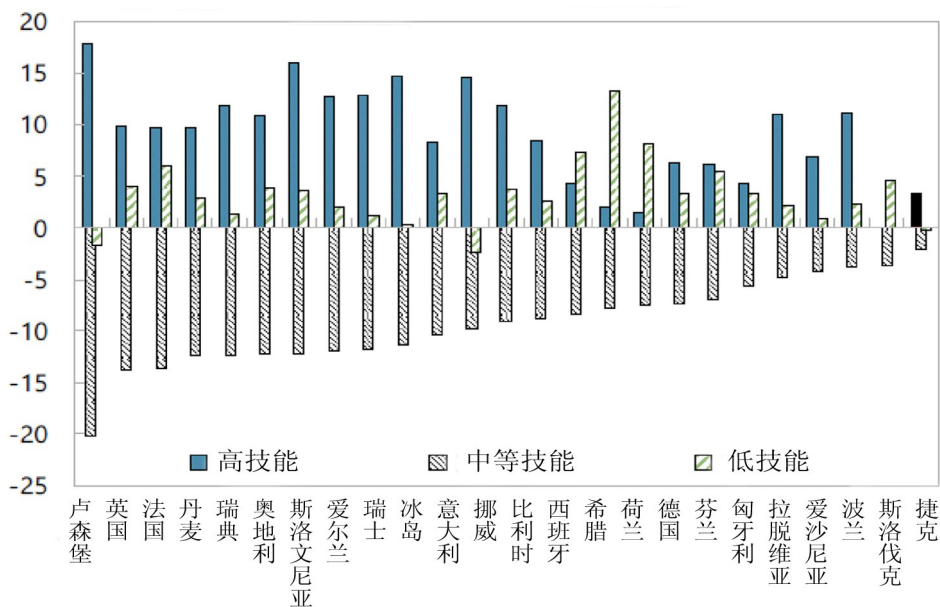
虽然目前中东欧四国的劳动力市场比较活跃,但从劳动力的结构看,中东欧四国也存在相当的隐忧,主要表现在劳动技能方面。从数据分析上看,波兰的高技能就业人数增幅较大,匈牙利的高、中等技能的就业人数增加较少,捷克仅有小幅的高技能人数增长,而斯洛伐克也表现为中等技能就业人数的增长(见图13)。这个结构性问题存在的原因其实已经超越了劳动力市场本身,涉及国家的教育与创新体系,当然也会长期影响中东欧四国在区域与全球价值链中的能力。因此,未来中东欧四国的劳动生产率是否可以继续保持上升趋势,包括未来劳动力供给是否适合区域和全球价值链中竞争的需要?这些问题尚需时日进行检验并作出回答。

图 12 部分国家国外最终需求中的每位工人的增加值 (千美元)



资料来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关于捷克的2018年经济调查》,第42页, https://www.oecd-ilibrary.org/economics/oecd-economic-surveys-czech-republic_19990561, 2020年1月15日访问。

图 13 1997-2017 年按技能分类的总就业人数份额(百分比变化)



资料来源:《捷克:2019年第四条磋商》报告,第33页。

此外,从欧盟范围内的劳动力市场变化的外部影响来看,德国政府2019年通过了《专业人才移民法》,^①将向非欧盟国家的高技能工人开放本国的劳动力市场。这也会中东欧国家的劳动力市场造成结构性影响,四国国内的高素质劳动力,包括来自乌克兰等国的技术移民工人,可能更倾向于选择德国的相对高收入的就业岗位,但这是否会形成规模性效应,还有待观察。

教育对劳动力市场供给的影响显然是长期和隐性的。中东欧四国在前计划经济时代一直享有较高水平的公共教育覆盖率。但从欧洲范围内的教育公共支出占GDP比例的比较而言,目前,匈牙利、波兰位于欧盟28国中游水平,而捷克和斯洛伐克则低于欧盟平均水平(见图14)。其中捷克教育公共投入低的原因非常复杂。理论上,捷克有大量的外汇盈余,政府公共债务水平极低,对于人力资本和社会保障投入有大量的财政空间。但捷克目前对于教育的公共投入恰恰是中东欧四国中最低的。2019年《欧洲可持续发展报告》(Europ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eport)的数据显示,^②在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设定的17个目标上,捷克排名第七,其在消灭贫困、劳动保障和经济增长等指标上表现非常靓丽,但是在优质教育供给上却停滞不前。另外,根据“第三次国际数学和科学研究(TIMSS)”的考试结果数据显示,^③虽然捷克的教育公共投资低于西欧国家,但捷克学生的考试成绩却胜过大部分西欧的学生,而教育投资较大的美国、丹麦的排名却不理想。当然,从教育评估的全面性来看,考试成绩不是唯一衡量指标,捷克是目前欧洲校际分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教育存在极大的不平等和差异化。^④而捷克教育、青年和体育部制定的最新战略计划是《2011-2015年高等教育学校的学术、科研、发展、创新、艺术和其他创造性活动的战略计划》。^⑤其根据捷克目前的国内产业人才需求,重视职业教育,推行了“职业技术鸟巢计划”。因此,捷克的高等教育目标已经不再是以研究型教育为目标,培养社会精英和科学家,而

^① 《德国专业人才移民法2020年3月生效 签证审批将提速》,中国侨网, <http://www.chinaqw.com/hqhr/2019/12-23/240671.shtml>, 2020年1月15日访问。

^② 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领导专家小组发布的《欧洲可持续发展报告》(Europ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eport), https://s3.amazonaws.com/sustainabledevelopment.report/2019/2019_europe_sustainable_development_report.pdf, 2020年1月15日访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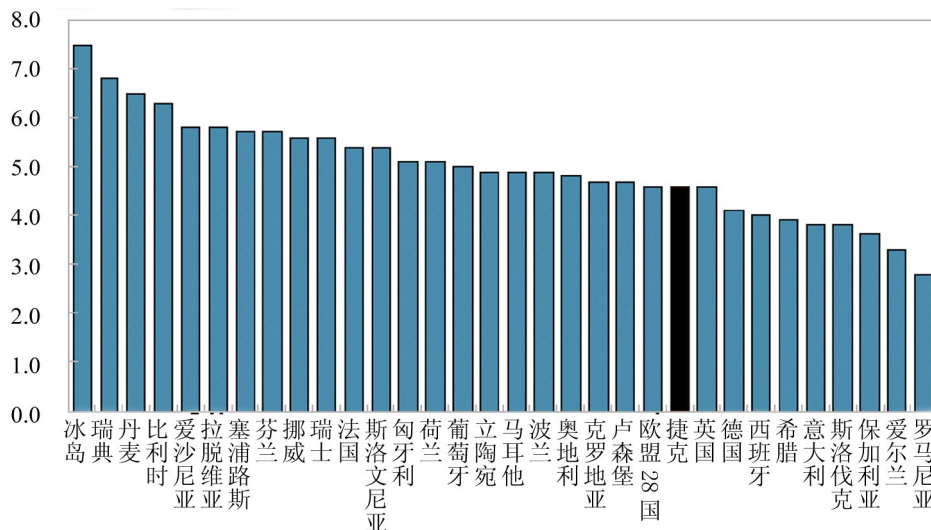
^③ 第三次国际数学和科学研究(TIMSS)网站, <https://timssandpirls.bc.edu/timss-landing.html>, 2020年1月15日访问。

^④ Jana Straková, “Educational Inequalities in the Czech Republic,” *Prospects: Quarterly Review of Comparative Education*, Vol.36, No.4, 2006, pp.517-527.

^⑤ 捷克教育、青年和体育部网站, http://pdc.ceu.hu/view/source/Ministry_of_Education,_Youth_and_Sports,_Czech_Republic.html, 2020年1月15日访问。

是转向教导实践动手技巧,可以普遍适用于各种工作和劳动。^① 而这一教育目标和模式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受到德国“二元制”教育模式的影响。但遗憾的是,捷克没有德国如此众多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包括历史悠久的科研机构,这可能为其未来的技术领域高端研发埋下投入不足的隐忧。

图 14 欧洲 2017 年教育公共支出状况(占 GDP 的百分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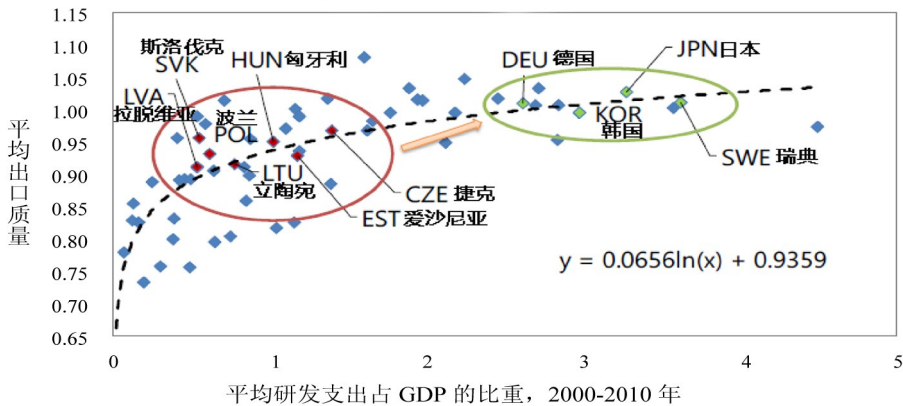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捷克:2019 年第四条磋商》报告,第 31 页。

有关研究表明,产品出口质量与研发支出具有一定的相关性。而从国际比较角度看,目前,中东欧波兰、匈牙利、捷克和斯洛伐克四国的出口质量和研发支出,均低于德国、瑞典、日本和韩国等制造业发达国家。虽然从产品出口质量看,目前中东欧四国与全球先进制造业国家的差距不算太大,但研发与创新支出占 GDP 比重却明显落后于德国、瑞典、日本和韩国(见图 15)。而这不仅对于本土技术的可持续提升具有长期负面影响,同时也显示中东欧四国本身目前并非区域与全球的技术驱动国,其相对质量较高的制造是建立在德国技术体系上,或者更直接地说,中东欧四国目前是作为德国

^① Jiri Pavelka, “Trends Emerging on the Czech Higher-education Market and their Influence on the Employability of Graduates in Practice since 1989,” *Procedia -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Vol.139, 2014, pp.87-92.

“离岸工厂”而存在的典型。^①

图 15 出口质量和研发支出相关性



资料来源:《斯洛伐克:2019年第四条磋商》报告,第19页。

从创新驱动的总体比较来看,根据《2019年度彭博创新指数》(2019 Bloomberg Innovation Index)公布的排名,^②依据研发强度、制造业附加值、劳动生产率、高科技密度、高等教育率、研发人员密集度和专利活动这7个指标对全球60个国家或地区进行的排名,中东欧国家中创新指数较高的国家排名依次为:波兰(第22名)、捷克(第25名)和罗马尼亚(第29名)。匈牙利排第32名,斯洛伐克是第39名。而在全世界创新指数排名中相对较高的是韩国(第1名)、德国(第2名)和中国(第16名)。由于看到自身的发展短板,波兰政府近年来积极调整产业发展导向,大力支持高科技产业,如航空航天、电动汽车等,高科技产业集群已经初现端倪,并为中东欧国家向创新转型树立了典范。

在全球激烈的新一轮科技创新中,除了已经积极行动的波兰外,捷克也显然感到创新不足带来的压力,遂于2019年2月批准通过《捷克共和国创新战略2019-2030》(Czech Republic Innovation Strategy 2019-2030),开始高度重视研发和创新。该战略包

^① 学者们已经注意到德国“离岸工厂”在全球和中东欧的先发优势,具体研究参见 Thomas Beissinger et al., “Offshoring and Labour Market Reforms in Germany: Assessment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Economic Modelling*, Vol.53, 2016, pp.314-333。

^② 相关信息参见《德国几乎抓住韩国作为创新冠军的篮板球》,彭博社,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9-01-22/germany-nearly-catches-korea-as-innovation-champ-u-s-rebounds>, 2020年1月15日访问。

含 9 个战略发展支柱,政府保证在 2020 年将研发(R&D)投入占 GDP 的比例提升到 2%,直至 2030 年提升到 3%。同时捷克也注意到自身市场开放、中小企业竞争力充沛的优势,强调通过研发整合、公私机构互动补充的方式,力争将捷克打造为研发之国、技术之国、创业之国和数字之国。^① 同样,匈牙利在 2018 年的新政府成立后,也建立了新的创新和技术部,积极推动匈牙利科学院的内部改革,并确定了健康医疗、汽车与机械工业、清洁能源、环境、健康食品和农业六个领域的创新驱动,努力提升国内目前不到 1.4%的研发投入向高水平提升。同时,匈牙利注意到自身劳动力市场的特点和经济转型需要,积极推动并参照德国和奥地利职业教育标准,开始贯彻职业教育 4.0 战略,并在 2019 年初启动超高速互联网 2.0 建设计划,力求为匈牙利的数字化和智能化发展做好准备。^② 而斯洛伐克由于先天的研发积累和资金缺陷,其在研发和创新方面一直处于弱势地位。根据斯洛伐克研究与开发活动组织(SOVVA)的分析,斯洛伐克的创新一直受到欧盟的资金支持,高达 89.1%的国外资金来自欧盟,占有国内研发资源的 39.4%,其创新体系、研发投入水平都不如其他三国。运营计划研究与创新项目(OPRI)是斯洛伐克研发部门的主要资金来源,在共计 39.88 亿欧元的研发经费中,欧盟研发基金(ERDF)就资助了 22.26 亿欧元。^③ 因此,来自战略认知、科技积累、可持续的资金投入、研发环境优化等方面的挑战,已经构成中东欧国家创新发展、提升经济层级和全球价值链中收益的普遍难题。

结 语

在加入欧盟 15 年以来的经济转型过程中,波兰、匈牙利、捷克和斯洛伐克受益于靠近西欧市场的地理位置、低成本的劳动力市场、发达的供应链基础和周围经济体的产业聚集效应,推动了其在全球与区域价值链中的深度参与和高度整合。在以德国为核心的产业链切入基础上,中东欧四国的产业链和欧洲区域中的意大利、法国、英国等紧密联系,产生了区域价值链紧密合作共同体,同时,形成了以技术吸收为导向,劳动生产率提升为基础,低失业率为支撑的良性“经济转型”。分析中东欧四国入盟后的

^① 具体报告内容,参见《捷克共和国创新战略 2019-2030 年》,捷克共和国政府办公室, <https://www.vyzkum.cz/FrontAktualita.aspx?aktualita=867990>, 2020 年 1 月 15 日访问。

^② 具体报告内容,参见《匈牙利创新行业投资者概况》, <https://hipa.hu/images/HIP/Innovation%20sector%20overview.pdf>, 2020 年 1 月 15 日访问。

^③ 欧盟“地平线 2020”研发和创新资助计划网站, <https://esrc.ukri.org/research/international-research/horizon-2020/>, 2020 年 1 月 15 日访问。

经济转型和经济结构转变,需要在如下方面认真思考和研究。

首先,区域价值链作为全球价值链的有效组成,其产生和发挥产业协同效应是需要前提条件的,其中技术、资本、制造配套、劳动力和全球价值链能力的有机组合是核心要素。而就中东欧四国与德国产业整合形成的区域价值链特点角度看,德国以技术与资本为依托的“主导国和驱动国”的作用是明显的,德国强大的产业基础和全球价值链能力的存在是区域价值链形成的必要前提。同时,作为区域价值链的重要参与者,中东欧四国既有的产业配套基础、开放的市场与适度的劳动力技能,是其可以融入以德国为核心的区域价值链的充分条件,而两者融合共同发生作用的充要条件的满足才是实现区域价值链效应放大的原因。因此,就区域价值链的建设,特别是对于中国目前推动的“一带一路”高质量建设的借鉴而言,欧洲区域价值链的形成要素和内在条件约束分析具有典型意义。中国应该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更注重区域价值链的建设和生产性基础要素条件的改善。作为与德国并列的全球三大价值链中心之一的中国,有机会利用自身的全球价值链的产业能力,带动“一带一路”区域价值链的建设与发展。但这个区域价值链的良性发展更需要有来自产业链间的有机结合而产生溢出、共赢效应。

其次,中东欧四国的长期“经济转型”与所取得的成就,特别是以实体制造业为切入点、融入德国产业链和区域价值链的经验证明了“经济转型”本身没有教科书上的经验可以借鉴。优先发展制造业、抑制金融和虚拟经济服务业,曾被认为是不符合经济增长内在长期逻辑的。但中东欧四国的经济转型史,向世界证明了实体经济与中高端制造业的极端重要性。它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压舱石”和“稳定剂”。特别是在技术革命夹杂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当下,制造业不仅因为进一步受到专业化和细分化的影响而在提升自身的附加值,同时也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增加民族国家自身的“政治话语权”。^①此外,中高端制造业所负载的全球与区域价值链能力,也成为国家对抗各种内外危机的“硬核工具”,其为经济社会稳定提供了超越经济价值的溢出功能。而这一点在中东欧国家经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2010年欧债危机,包括今天的中美贸易战中,都再次凸显了制造业对于国家经济的核心战略价值。

最后,虽然目前中东欧四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表现优异,经常被誉为“转型优等

^① 制造业受专业化影响而逐步提高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收益,使得“微笑曲线”开始向“武藏曲线”进行变化,而不仅已经被德国、日本的产业实践所证明,同时一个国家因制造业能力的全球存在,其对外部冲击有明显抗压能力,进而获得更多的“政治话语权”也在中美贸易摩擦中得到验证。有关制造业因专业化影响而提升收益进而修正“微笑曲线”的进一步研究与讨论,参见世界贸易组织的《2019年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

生”。但是,应该客观地看到,波兰、匈牙利、捷克和斯洛伐克在区域价值链中后向参与度更高,多为加工制成品再转出口的产业配套,使其无法减少对西欧的贸易、市场、资本、技术的高度依赖。四国的优势产业,也可称之为国民经济的命脉——汽车行业的发展也完全依赖于德国的知名车企提供的订单。而这种劳动密集型增长模式,在新技术革命的背景下将变得越来越难以持续和维护,极易受到来自新技术变革的深刻影响,如智能制造、无人工厂、机器人技术进步等诸多新因素的干扰。此外,从长期可持续发展角度看,中东欧四国目前的教育、研发和创新的投入依然较少,优质劳动力供给长期保障不足。在此背景下,中东欧国家如何面对以5G、云计算、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为发展方向的全球新一轮技术革命,并在新的竞争中维护和提升自身在全球与区域价值链中的能力,显然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问题,值得进一步探究。

因此,就中东欧四国入盟15年的阶段性进步而言,其取得的长足进步,无论是基于其融入欧盟市场与德国产业链所取得的成功,还是其准确把握全球化历史机遇和自身产业定位,并在全球与区域价值链中积极努力寻求嵌入和融入,都是值得赞扬和称道的。但从“经济转型”到“可持续成长”,再到引领“创新驱动”,显然是没有终点的国家发展持续竞争力的竞赛,而无论就走向繁荣这个终极目标而言,还是就“转型”这个宏观的命题而言,中东欧国家显然还处于“未完成的状态”。

(作者简介:余南平,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教授;夏菁,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硕士研究生。责任编辑:莫伟)